

對話袁國勇 上篇

應對公共衛生危機，應回到科學本位



探尋思想的津渡 守望文明的驛亭



在香港大學醫學院，或在更廣闊的香港醫學界和公眾視野中，袁國勇醫生無疑已是傳奇。8月25日，適逢國家科技部公布香港15間全國重點實驗室名單，由袁國勇等領銜的新發傳染病實驗室名列首位。

作為專耕微生物領域的醫學家，數十年來，袁國勇如竭忠盡智的偵探，以顯微鏡為武器，探幽知微、殫精竭慮，持續守衛於香港公共健康防線的最前列。特別是在2003年沙士和2019年底開始的三年新冠病毒公共衛生危機期間，他所體現出的憐憫心、責任感、領導力，與捨我其誰的擔當精神，贏得了香港各界的普遍讚譽。其聲譽之盛、造詣之深、公眾之信任程度，堪與內地著名醫生鍾南山、張文宏等相提並論。

不過，這位已名揚四海、備受公眾矚目和同行尊敬的醫學專家，行事風格卻頗有出人意料處。最新一例，是他今年7月出版的傳記作品《顯微鏡下看蒼穹——袁國勇自述》中文版，全書350頁，在敘述完自己的人生章節後，最後27頁居然刊發了一段完全無涉的他人故事。如此出人意料的結尾安排，至少在華人世界的傳記出版領域，罕有其聞。如此至情至性、別具一格的處理方式，在袁國勇近70年人生中其實並非首次，其不恤人言、特立獨行的氣質，早年已多有顯露：

還是1982年，已完成港大醫學院學業的袁國勇，放棄更為知名的瑪麗醫院，而選擇入職當時既小還偏遠的聯合醫院急症科；1988年加入瑪麗醫院時，居然選擇少有人關注的微生物科。「當時的醫學界，人人都熱衷於癌症和心血管病的研究，對傳染病的教研不感興趣。」袁國勇在一個看似冷僻小眾的領域安營紮寨下來，就此投入餘生。

捨康莊大道而另走「窄門」，是一種可彰卻不易領悟的人生智慧。「我曾考慮選擇神經外科作為專科訓練，但我有自知之明，最後還是打消了這個念頭。」從後世的視角看，傳染病的研究非常重要。「本港開埠以來，只有地緣政治變化例如戰爭，或瘟疫能癱瘓本港。」1894年香港曾爆發鼠疫，當時香港人口由約20萬驟減至8-9萬，其中因染疫去世者接近2萬4千人，多為貧困人口及居住環境惡劣者。

1999年晉升為港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後，袁國勇開始研究如何保障本



●袁國勇醫生 記者全子懿 攝

港市民健康及安全，藉此定下未來發展方向：

「本部門無能力介入及阻止地緣政治糾紛，但由細菌或病毒所引起之醫治，倒是我們能力範圍內可有所作為之事。」

袁國勇寫道：「我當時已深信在往後的數十年，全球終有一天要召喚這一科的醫學專家，協助化解瘟疫危機，預防爆發，藉此減輕數百萬人受到傳染病的威脅。」

這也是香港以袁國勇為代表的微生物學家和公衛專家們後來成果迭

出、在國際上引起重視的開始。他的團隊在《柳葉刀》《自然》《科學》等國際權威醫學和學術期刊上，發表了超過一百篇通過同行評審的科研論文。沙士後，袁國勇團隊發現中華菊頭蝠為類沙士冠狀病毒的天然宿主。2020年，由袁國勇和同事撰寫的「新冠具備人傳人能力」之論文發表在《柳葉刀》上，2023年2月，該文被評為《柳葉刀》兩百年來34篇最重要醫學成就及突破性發現之一。這是香港唯一入選論文，另有兩篇為內地學者所撰，其醫學發現之地位與消毒及應用無菌技術進行手術、使用盤尼西林等相若。

由此，香港以沙士科研名世，全球各地學者每逢撰寫有關沙士或新發傳染病之論文，必定引用本港學者之研究。還在2004年，美國《時代》周刊一篇文章就讚稱：「香港大學對沙士及禽流感的研究，令這一地區性大學昇華到國際舞台，而其團隊成員也明白自己任重而道遠，是世界防疫橋頭堡的重要一員。」2007年，袁國勇以其成就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。

2025年7月底，袁國勇教授於港大醫學院一間簡樸辦公室接受本報記者的訪問。白大褂下，袁國勇醫生仍然身著港人熟悉的淺灰外套、紅色領帶，此公眾形象已保持多年不變。看到這，或不免想起卓別林默片中的文明帽手杖、小津安二郎的低度攝影視角、作家李敖的紅色夾克、歌手林子祥的小鬍子。這也是袁教授為人行事的特異之處，或許西裝太嚴肅和拘謹，缺乏想像力，此裝扮應該是一個早已在心靈深處建構起完整超驗世界的科學家，心無旁騖、屏息凝神、盡量不被俗務所擾的具體而微的體現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湖

香港文匯報記者：袁教授，您對香港乃至全球流行病醫學的研究貢獻，早為公眾所知。您在自傳中寫2003年沙士疫情開始時，當時的心情是感到「大禍臨頭」。那麼當您了解到2019年底武漢發生新冠疫情時，心情是更沉重了，還是說已有多年的流行病醫學研究做支撐，會好一些？

袁國勇：其實還在2003年3月，我們就已在野生動物的病毒監測方面進行工作，到2005年已找到了蝙蝠沙士病毒株。2007年已發表文章指出，它還會再次出現，因為我們在中華菊頭蝠中，找到了蝙蝠沙士病毒株。根據那個基因排序，它應該是2003年SARS冠狀病毒的祖先親緣病毒，也是2019年SARS冠狀病毒二型的近親。新冠疫情發生時，當時內地有包括高福院士在內的兩位不同學者，幾乎在同一時間發表了關於2019年這次SARS冠狀病毒二型基因的報告。所以當我們得知消息時，一點也不覺得意外，因為早就預料到了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：您當時是否有心理準備，此次新冠疫情未來幾年將非常嚴重，會導致全港、全國、全球都必須推行封閉措施？

袁國勇：回顧歷史經驗，每當有新型傳染病出現時，都會導致全球大流行。通常只有當大部分人都感染過、產生了免疫力後，疫情才會結束。舉一個例子，就是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全球大流行，差不多持續了兩年，直到大部分人感染後才結束。同樣是其他地區的大規模疫病爆發，無論是2009年的豬流感，還是1957年的H2N2流感，都差不多兩年結束，基本上所有人都感染過。所以我當時就相信，今次應該會持續兩年左右。就看疫苗是早推出或遲推出，疫苗越早推出，公眾越早可以接種，疫情結束就會越早；否則就不會太快結束，而且還要看市民願不願意去接種。這次的情況就是，疫苗大約在一年左右推出，也就是從2020年開始緊急投入研發，到2020年11月疫苗才真正推出。但可惜香港接種速度慢了很多，花了將近兩年，直到2022年1、2月經歷了所謂第五波疫情後，疫情才差不多結束。但因為有清零政策，所以一直到2022年底才全面開放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：這兩次疫病的發生都與食用野生動物有關。是否可以肯定地說，如果不控制對野生動物的食用，包括家禽肉類的宰殺管理，類似情況未來還會出現？除了嚴格加強管理之外，還有其他可行辦法和處置手段嗎？

袁國勇：很多事情不能只靠法律來改變。要改變社會風氣，需要教育，很多深層次的思考和價值觀轉變。其中一項，我認為要談愛心。談愛心，不僅僅是對家人，也不只是對朋友、身邊人，還應該珍惜我們國家的野生動物，要尊重牠們的生存空間，牠們的棲息地，保護野生動物。不應該去捕捉牠們、圈養牠們，更不應該屠宰牠們，其實中國有很多美食，豬、牛、羊、雞、鴨、鵝、魚、蝦、蟹，已經很足夠了，這些食物裏的蛋白質，足以讓人類生存下去。野生動物有牠們獨特的微生物、獨有的病毒，對人類來說是無法適應的。當人類沒有那些免疫力時，你還主動去接觸它，它一進入你體內，你就很容易被感染，而且它會在人與人之間傳播。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有愛心，要愛我們的鄰舍，要愛我們的國家，愛我們的土地，不要污染它；要愛護我們的野生動物，牠們和人類一樣，都有生存的權利。當我們懷有這份愛心，擁有這樣的價值觀時，這些悲劇發生的機會就會小很多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：有一個問題，為何2003年香港的沙士疫情死亡率那麼高，當時高居全球第二（1755例呈報個案，299人染疫去世，沙士死亡率17%。數據來自袁國勇傳記P182頁），原因是什麼？2019年底開始的這次疫情，至2022年4月，香港去世人數已達9,000人，其中多是老人。您在著作中也描述說：「這是香港現代史上最嚴重的公共衛生災難之一，將永久烙印在港人心中。」殷鑒未遠，請您分析其中原因。如果時光可以倒流，預防工作做得更細緻，類似悲劇是否就可以不必發生？

袁國勇：所以我當時（2003年，編者註）真的非常憤怒，也立刻站出來抗議。災難即將來臨，但那個時候不管是哪方面的準備，都幾乎完全沒有。但到了第二次，大家都知道，從2003年到2019年，不論是香港還是內地，政府都做了很多事情，雖然還是很緊張，但比起2003年第一次是更好了。

回到2003年沙士香港的死亡人數，香港的特色是對於檢測非常嚴格，什麼事情都做得非常嚴謹，一個人過世了，只要檢驗出有SARS那個病毒株，就當作是病毒害死了他。但每一個個案單獨拿出來，很多是心臟病發去世、中風去世，可能和SARS冠狀病毒沒什麼關係，但香港連那些數字都算進去。當年政府被罵得很兇，被說隱瞞，政府於是什麼都攤開來講，全都公開，那就不要再吵了。這樣處理，所以數字就高了很多。但我不相信香港死亡率會比其他地方高。

2022年初的第五波疫情，很多人感到心灰意冷，其實根本不該發生。在第五波疫情爆發前，也就是到2022年初前有8個月時間，香港基本上都很正常。但很可惜，尤其是長者們沒有好好把握那8個月的時間接種疫苗，錯過了這個時機，真的很可惜。

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呢？有幾個很重要的因素：首先是最初推出的疫苗，大家都知道科興疫苗，當時藥廠明確表示是提供給比較年輕、65歲以下的人，而且要求沒有長期基礎疾病。這就讓很多市民特別是長者產生了錯覺，以為這些滅活疫苗對長者有危險。其實並不是。藥廠其實是為安全起見，怕將來有爭議，所以才這樣說。但很不

香港文匯報記者：我對一個細節很感興趣。2003年沙士病毒的天然宿主，您的團隊最終發現是蝙蝠。這是團隊在野外做了大量野生動物病毒監察研究的結果，您也說或許是潛意識受到「熱帶醫學之父」白文信的「蟲媒播病論」的影響。野生動物那麼多，天上飛的也多，怎麼最後就找到了蝙蝠？科學發現純屬偶然，還是也有規律性？

袁國勇：事實上在2003年之前，確實有病毒從蝙蝠傳染到其他動物，傳染到人類。舉幾個例子，一個是尼帕病毒，來自蝙蝠的一種病毒，另外一個是亨德拉病毒，同樣由蝙蝠傳染給人。尼帕病毒是由蝙蝠傳給豬，再傳給人，發生在馬來西亞以及新加坡、印度半島等地。亨德拉病毒源自澳洲，蝙蝠飛到馬來西亞後，接着又傳染給人類。還有其他病毒，例如有一種很接近狂犬病的病毒，叫做尼沙病毒，是由蝙蝠咬了人傳染給人類。還有馬堡病毒、伊波拉病毒，由蝙蝠傳給猩猩，然後傳播給人。所以發現這個病毒不是亂猜，是有依據的。

至於說祖師爺做的研究，對我有多少影響，我也不清楚，不過我相信會有些。港大醫學院第一任院長白文信（Patrick Manson）教授，是研究蚊子的，他從蚊子身上發現了絲蟲，又從絲蟲發現了象皮病，就是腳部的淋巴管會因為這種絲蟲感染而阻塞，導致病人的一隻腳腫得像大象腳一樣。那時他已經意識到，蚊子或是全世界對人類最具威脅性的動物。有些人以為最危險的是獅子老虎，不是，是蚊子。

對我來說，1997年嚴重威脅人類的禽流感，是我第一次參與的戰役。病毒是從哪裏來的？是在野鳥那邊，傳到雞或者鴨鵝那邊，再傳給人類。再就是2003年SARS和2019

幸，這讓香港很多長者甚至年輕人對疫苗都有一種錯覺，覺得打疫苗很危險。

第二個錯誤，是一開始打疫苗時，有長者打完當天就過世了，但他的去世有可能跟疫苗根本沒關係。因為當人年紀很大、七八十歲時，每天都有人過世，所以你說剛打完疫苗，隔天就去世了，是不是就意味着這個疫苗很爛？其實應該說明白，這位老人去世究竟是什麼原因，公布一位病人在接種疫苗後去世，應一併說明每天他這個年齡層有多少人去世，比如一千人中的去世情況，這樣大家就不會感到恐慌。否則，這樣反而讓「打疫苗是一件危險的事」的觀念，更深植在那些長者心中。

第三點就是無論當時還是現在，很多人認為疫苗是好的，但也有爭執。一些反疫苗人士經常在網絡上釋放信息，散播出去也會誤導人。

香港死了這麼多人，其實很多都不應該，完全是因為對科學理解不足。尤其是在長者之間，科學精神更加缺乏。幾百年前倫敦爆發過一場霍亂疫情，死了很多人，有位科學家畫了幅地圖，把所有死於霍亂的病人在地圖上標出位置。結果發現，絕大部分都在某條街的水龍頭附近。他把那個水龍頭的把手拆掉，讓人沒辦法再抽水，整個霍亂疫情就消失了。就是那口井的水裏有霍亂菌。那時候還不知道有霍亂菌，但他們還是想辦法控制住，為此還建了一座紀念碑。SARS我們有建紀念碑嗎？新冠這次死了這麼多人，有沒有建紀念碑？真的要重新檢討，不把事情弄清楚，疫情還會再發生。

年的新冠病毒，都一樣，萬變不離其宗，又是蝙蝠傳到果子狸或是其他動物，再傳到人類身上。所以你看，這麼多次下來，來來去去，包括現在正流行的基孔肯雅熱，都是蚊子、鳥類、蝙蝠這些會飛的生物。

我一直在想什麼才叫愛國，第一件事就是要說真話。有人說，你是不是不要講那麼多？或者說話不要那麼尖銳？我完全不同意。在一個公民社會裏面，每個人都有不同角色，我身為一名醫生、科學家，我有責任把事實和科學證據，清楚明白地表達出來。不應該去修飾它，讓它沒那麼尖銳，好讓大家更容易接受，不應該這樣。我要把這件事原原本本說出來。作為研究人員，我對這方面的研究可以說是最深入的，我覺得應該有什麼就說什麼，因為我的角色就是這個。不應該把角色混淆，比如把你的角色摻雜一些政治因素、經濟因素、媒體因素，像化妝師那樣，不應該這樣做。那不是我該扮演的角色。只要每一位公民，回歸他本來的角色，一切自然就會達到平衡。

科學真的很重要，法治真的很重要。我書裏面說了一句很特別的話：只要你越接近真實，你就越安全；你離真實越遠，你就越危險。如果你不允許別人提出質疑，不允許別人發表意見，這種時候你才是最危險的。